

门外野风开白莲

□ 姚维儒

正值蓝花楹盛花的五月,我们汪迷部落文学社一行人,为追寻汪曾祺的足迹来到昆明,并与昆明五华区文联举办了“寻访足迹 遇见美好”座谈交流会。该活动特意邀请了与汪曾祺有交集的张昆华、吴然和陈立言等老一辈作家到场交流分享。在现场,我们见到了汪曾祺珍贵的墨宝真迹和老资料,实属难得。原《云南日报》副刊部主任、《边疆文艺》副主编、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张昆华老先生兴趣盎然地向大家展示了汪曾祺于1996年为他画的莲花图,并简叙如何得到此画的经过。

汪曾祺写云南的一系列文章中,写了缅桂花树、尤加利(桉树)、仙人掌、木香花、叶子花、白茶花、牛肝菌、鸡枞菌、鸡油菌;写了翠湖的多孔石桥、圆圆的小岛以及堤岸上的柳树:“柳条拂肩,溶溶柳色,似乎透入体内”。他在借用苏东坡“故乡无此好湖山”之后加写了自己的诗句:“长堤柳色浓如许。”使张昆华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汪曾祺在翠湖边居住过4年多,还常去湖畔的省图书馆看书,常在茶馆里喝茶,十分熟悉那里的树木花草,但他为什么就没有写荷花呢?而在他的故乡高邮则是荷花铺天盖地的世界,如果他在昆明翠湖见到荷花,肯定就会触景生情而大书特书的。后来,汪曾祺在1984年5月9日写的散文《翠湖心影》中回答了这个疑问:“翠湖不种荷花,但是有许多浮莲。肥厚碧绿的猪耳状的叶子,开着一望无际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热闹。”这就是昆明人叫的水葫芦,高邮人也叫水葫芦。

不知是从哪年哪月起,翠湖种植了莲藕,开放了一朵又一朵彩云般的莲花,取代了大片大片的水葫芦花。漫长的光阴一直延绵到1987年4月,在汪曾祺离别“第二故乡”41年后才得以重返昆明。他是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代表团,前来渴望已久的云南进行访问采风活动的。张昆华便告诉他:“翠湖依旧,杨柳常绿。只是在你离昆后的某个盛夏,翠湖梦醒般地开满了半池荷花……”

这趟云南之旅,张昆华利用空隙时间,特地陪汪曾祺在夕阳悠悠沉下西山之际,匆匆赶赴翠湖,径直来到翠湖东门一侧的荷塘边。手扶栏杆极目远眺,只见湖面上新生的一片片荷叶,在晚风中洋洋得意地挥手摇晃,犹如一朵朵舞蹈

的水波;又见一只只紫色的燕子冲破暮霭飞翔,洒下一声声啼鸣……可是,心急也难获近利,他们上下左右地寻觅,都没有发现一枝莲花。确实令人茫然,深感惆怅。汪曾祺摇摇头,叹口气说道:“昆明春天来得早,而莲花最早也要到夏天才开放呀……”他们只好沿着湖岸漫步。暮色渐渐苍凉,华灯悄悄明亮。虽然没有看到翠湖的荷花,但张昆华似乎从汪曾祺的眼里看到了闪亮的泪珠,那泪珠就像是

他心中的荷花……

1997年1月,温暖如春的昆明,汪曾祺参加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率领的作家代表团再一次去玉溪出席“红塔山笔会”。会后返京前,在昆明稍事停留。1月13日下午,张昆华去作家代表团住宿的佳华大酒店拜访汪曾祺。新年喜庆的气氛还未消散。张昆华与汪曾祺在酒店大堂的圣诞节小屋和圣诞节灯树前合影留念。笑谈中,张昆华特意提起汪曾祺去年夏天赠他的国画《门外野风开白莲》。张昆华说:那绿叶相拥的白莲花,真是越看越美,堪称文人画中的精品。汪老微笑着连连摆手,并解释创意:“之所以画白莲花送你,是为了弥补10年前我们去翠湖看荷花而荷花尚未开放的遗憾……”张昆华半开玩笑地调侃道:“我要是将白莲图卖掉咋办?”汪曾祺爽朗地笑着说:“可以卖啊,卖价越高说明我的画越好。”

令人深感悲痛的是,汪曾祺1997年1月第5次来昆明,不幸成为他生命中对“第二故乡”的最后访问。他从昆明飞回北京4个月后的5月16日,因突发疾病与世长辞。

张昆华在《寻呼汪曾祺》一文中披露:他曾给汪曾祺先生写信,大意是汪老去年送给他的国画《门外野风开白莲》,受到文友们的高度赞赏,他想翻拍后配篇文章一起发去。可能那幅画的照片正在途中,就收到作家李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那悲怆的声音告诉他:“你翻拍的汪老白莲花国画的照片,今天刚寄到北京,可他已看不见了;你在那本杂志上对汪老的寻呼,他也不能回应了……”张昆华的心在紧缩,握电话机的手在颤抖。

我告诉张老,现在市面上汪曾祺的字画行情看涨,张老说行情再涨也不会卖。此画作为他们家的传世珍宝,会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我问张老,汪老的莲花图裱头背后为什么会出现“汪曾祺白莲花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 昆明”的

一行题辞。张老告诉我:“该画是汪先生在北京画好,来昆明时特意赠送给我的。他然后去边疆各地采风访问,这期间我到画店裱好。在汪先生回昆将返京前夕,我与作家代表团相聚于宴会,带了裱画去展示。因展示的字画比较多,率团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当场建议在裱头题字留念。汪老即掏出钢笔写了此题辞,更显此画的弥足珍贵。”至于这幅白莲图上为什么题辞“门外野风开白莲”,应该是引用了王士禛《再过露筋祠》诗中的最后一句:“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如烟。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

汪老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写道:“我在昆明呆了7年。除了高邮、北京,在这里时间最长,按居留次序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世界在变,汪曾祺与云南的情愫没变,昆明和西南联大是汪曾祺的文学摇篮,孕育了后来的一代文学大师,汪老除写家乡高邮以外,写得最多的就是昆明,昆明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情愫。莲花图见证了汪老与张昆华的感情,亦成了文坛一段佳话。

高邮一位资深汪迷,十分欣赏汪老的白莲图,并有心想通过转让得到白莲图,就托我婉转地向张老表此心迹。我也喜欢汪老的白莲图,并有心促成此事。张昆华老先生听懂我的意思后,表示此画系非卖品,并请这位汪迷断了这个念头。哪知收藏爱好者一旦爱上心仪的物件常常会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经过我三番五次做“工作”,张老绷紧的发条竟松动了,他在微信上说:“姚社长的意见我考虑良久,让汪老的白莲图回归汪老的家乡,也许是最好的归宿。其实这不是买卖的事,而是汪迷部落文学社文友们在昆明座谈会上见此画后,感到特别珍爱,很想要去在汪老家乡珍存,使更多乡亲能永久看到汪老心中的艺术莲花,犹如文物那样,我才依依不舍、理所当然地含着老泪将原画转让到高邮。”张老先生邮寄此画前又无限深情地对我说:“你在昆明寻找汪曾祺足迹座谈会上见到的白莲图,如今又来到了你的眼前,美丽亲近,成了高邮的花。汪老的文化艺术回到了家乡,这是你的功劳和贡献!”

高邮喜收汪老的莲花图,历史文化名城又添文化宝藏。一幅莲花图竟成了京滇邮三地文化交流的纽带。

孔子何时学《易》

□ 姚正安

看到这个题目,方家不免发笑,说,这还是个问题吗,《史记·孔子世家》不是说得很清楚?

是的,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确实对孔子学《易》作了记述: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司马迁说,孔子晚年喜欢研习《周易》,他详细解释了《彖辞》《系辞》《卦》《文言》等。孔子学习《周易》非常刻苦,曾经多次把编穿竹简的牛皮绳磨断了。孔子还说:“如果可以让我多活几年,我就能对《周易》的文辞和义理作更充分的掌握理解。”

从司马迁的这段文字中,我们获取了四点信息:孔子晚年研习《周易》;孔子对《周易》的彖、系等做了详细解释;孔子学习《周易》非常用功刻苦;孔子感到自己研习《周易》太晚了,因而发出“假我数年”的感慨。

我们知道,司马迁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作古三百多年,司马迁所作《史记·孔子世家》的不少内容来源于《论语》。

事实也正是如此,《论语》里也有孔子学习《周易》的记载。

《论语·述而第七》这样记道: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比较《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论语》的记述不仅非常简单,而且有明显差异。司马迁只说孔子“晚而喜易”,没有出现具体的时间,而《论语》中出现了“五十”。两文引用孔子话语的内容也有不同。

从《述而第七》的这段文义来看,似乎孔子五十岁前就学习《周易》了,而且预感到自己活不到五十岁——“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事实上,孔子活了七十三年。

那么,孔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周易》,对于《述而第七》这段又作何解释? 这成了问题。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无论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还是金良年先生翻译的《四书章句集注》,对于“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翻译,大致都是“让我多活几年,到五十岁时研习《周易》,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

幸好金良年先生在翻译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时,保留了朱熹的原注。

我们来看看朱熹对《述而第七》这段文字是如何注解的。

朱熹说:“盖加、假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近而误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

朱熹的注解辨析了两个字,一是加应该是假,二是五十应是卒,因为竖排而把一个字看成了两个字,这方面的例子是有的。王念孙在考证《触誓说赵太后》时,就认为“誓”是“龙言”两个字,应该是《触龙言说赵太后》,后来出土的竹简证明,王念孙的考证是正确的。

再回到朱熹的注解上来,按照朱熹的说法,应该翻译成“上天假我几年,让我完成(卒是完成的意思)对《周易》的研习,那么,我对《周易》的掌握理解就不会出现大的过错了”。“无大过”,不是指孔子的行为处事,而是指对《周易》的研习。

这样的解释,也正与司马迁的“彬彬”相合。

我们想想,司马迁为什么不完全采用《述而第七》这段文字,他显然是发现了其中的讹错。

近代大儒辜鸿铭先生在《辜鸿铭讲论语》中,对于《述而第七》这一章的解读,直接回避了“五十”,而翻译成“如果我可以多活几年,去完成对《周易》的研究,那么在我的人生中便不会有什么比较大的遗憾了”。

辜之说与司马迁所说的不同在于对“无大过矣”的解读。辜突出孔子的人生境界追求,司马迁突出孔子对《周易》的把握理解。大多数《论语》研究专家都与辜之说一致,但我以为,两种解读都不妨害文义的表达。

《易》乃群经之首,百科全书,其玄奥艰深非常人能解,圣人孔子在研习过程中发出“假我数年”的感慨,以及穷理尽义中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情理之中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研习《周易》的时间应该是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之后。

有人势必要说,既然知道“五十”之误,为什么不改过来呢? 是的,不论哪个版本都保留了“五十”。修改经典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尽量保留经典的原貌也是经典传承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不能囫囵吞枣,大而化之,而要贯通全书,多方探求,用心体悟。正如程颐在谈到自己学习《论语》的体会时说:“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程颐告诉我们,在学习《论语》时要“求”“味”“思”,还要平心静气、从容不迫,对疑难问题不轻易下结论,细细揣摩,这样才能与圣人进行心灵交流,而领悟圣意。这不正是我们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应取的方法和态度吗?

泉州开元寺双塔

□ 汪泰

进入泉州地界,从高速列车上往外看,沿线,薄薄的红屋顶,一片片,一排排,一簇簇,清清爽爽,很是悦目。

泉州街头,多二三层小楼,楼檐有小动物雕像;红花,红灯笼,红屋顶,红墙面,还有许多店铺木质门窗表面露出的原木色,富有诗意的多层塔楼,充满着古老的气息;金鱼巷,花巷,西街,美不胜收,显示着当下的繁华。

古老的开元寺,承天寺,文庙,关岳庙,天后宫,清净寺(清真寺),清源山和老子像,两座大型博物馆……蕴含着厚重的历史。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一座佛教寺庙,犹如一座博物馆。”又说:“一个中小城市的寺庙,实际上就是一个美术馆。它同时又是一所公园。”确实如此。雕塑,壁画,建筑……由此派生出建筑、绘画、音乐、文学等艺术的繁荣及发展,古庙宇教堂寺院也成了多种美学的研究源头,这是世界的共性。

泉州城里,印象深的是开元寺内的双石塔。开元寺,原建于唐垂拱二年(公

元686年)。两座石塔,一东一西,以其沧桑的身形,向人们倾诉它远古的历史。东塔原名“镇国塔”,西塔原叫“仁寿塔”。两塔分别始建于唐(公元865年)和五代(公元916年),均遭遇火焚后以石塔重建于宋。两塔均为八角五层楼阁式仿木花岗石塔,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大的一对石塔。来到塔脚下,抬头仰望塔身,一定会被两塔的美轮美奂所折服,所震撼。每层塔身的每一面,有人物浮雕,栩栩如生,比例得当,温和似菩萨,凶煞如金刚,夸张而不失真,盔甲甲片如鳞,衣纹顺柔舒畅;树木花草,鸟兽鱼虫,祥云万物,叙说着古老的宗教与世俗的故事,显示着宋朝年间石刻的艺术水准。因没有照相术与现实主义的绘画术,古中国缺少人物肖像的留传,这些浮雕上的人像,圆润,丰腴,慈祥,庄严,凶煞,给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人的面容,拉近了不同年代人的距离。似觉得,上面的每尊雕像,又何尝不是依着匠人的父母兄妹、周边亲人的模样儿一凿一凿刻出来的,这才是匠人心中的神。